

理论经纬

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路径

■刘长利¹ 赵增华²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自我革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理想信念、政治操守、作风形象等形成强大政治力量、真理力量、组织力量、队伍力量和人格力量的凝聚而成的强大动能,实践路径表现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组织凝聚力、队伍战斗力、精神感召力。

一是接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增强政治领导力的关键是坚持“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增强政治领导力的根基是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必须牢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人民情怀、坚守初心使命、坚持人民至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是显著提升党的思想引领力。提升党的思想引领力,基础是提高党的理论创新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升党的思想引领力,要提高理论传播力。“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必须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尤其要注意改进理论传播方式,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鲜活语言和生动形式宣讲理论,让基层党员和群众好懂、喜欢、好用。

三是时刻彰显党的组织凝聚力。彰显党的组织凝聚力,必须把严密党的组织体系作为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重点来抓,凡是符合建立党组织条件的地方都要把党组织建起来,凡是有党组织的地方都要让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强起来,使其能够担负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关爱党员

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坚持党的各级组织建设同抓共管,以上率下、以上带下,形成上下贯通、全面覆盖的组织建设大局和党的工作高效运转、党的管理井然有序、党的决策执行有力的好局面。

四是坚决提高党的队伍战斗力。队伍战斗力强从来就是党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强党的一个主要标志。提高党的队伍战斗力,干部是决定因素,必须适应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方位增强执政本领,尤其要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和斗争本领。要围绕增强战斗力完善干部教育培训、考核评价、选拔任用、激励担当等机制,增强干部培训的科学性、及时性、针对性、有效性,突破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难点,探索能者上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途径,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强国强国的伟大事业中来。

五是赓续凸显党的精神感召力。凸显党的精神感召力,党赋予伟大建党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用新的奋斗、新的创造、新的奉献铸就了“三牛”精神、脱贫攻坚精神、伟大抗疫精神等,成为新时代党的精神标识。凸显党的精神感召力,必须牢记“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的告诫,坚持把学理论、悟真谛、强信仰、增信念有机结合起来。凸显党的精神感召力,必须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党员干部终身课题,树牢为人民而奋斗的价值观念和人生观、造福人民的事业观和政绩观。

江山壮麗,前程远大;使命催征,辉映未来。党坚持自我革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彰显了人民立场的目标指向、突出了人民主体地位的历史指向、表达了增进人民福祉的价值指向,从而紧紧依靠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单位:1中共济宁市委党校 2中共微山县委党校)

从《训俭示廉》看司马光的廉政思想

■毛杨柳

“廉者,政之本也。”清廉是中国古代官德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从政者为政做官的基础。一个人,如果为官不廉,便是失德失责,就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损害。正所谓“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国家之所以衰败,政权之所以不稳,其中关键一点就是由官员的腐败所造成的。因此,清廉对于一个人的安身立命,以至于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都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作为为官之本和考核之本的基本精神,清正廉洁的思想理念孕育了中国历史上无数的清官廉吏,他们的高德义行和道德风范流芳千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浩荡长波里的一支清流。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一代名臣司马光病逝,终年六十八岁。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光一生清廉简朴,虽为官四十余载,位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却一生克勤克俭,清正自守,除应得的俸禄外,从不收取分文的馈赠。为专心编修《资治通鉴》,司马光住在洛阳城郊的一个小巷子里,住所极为简陋,仅能避风避雨。为避暑热,他特地请来工匠挖地穴,修筑地下室用以读书写作。大臣王拱辰当时也住在洛阳,其宅第高耸入云,顶层被称为“朝天阁”,所以当时的洛阳城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王家钻天,司马入地。”

司马光不仅要求自己克勤克俭,对于家人也同样严格要求。他以家书的形式写给独子司马康一篇著名的训诫文章——《训俭示廉》。《训俭示廉》一文可谓字字珠玑,通篇核心思想其实就是一个字——“俭”。北宋初年,奢靡之风渐起,人们竞相讲排场、比阔气,崇尚奢华、嘲讽节俭一时间成为社会主流。面对此种社会状况,司马光痛心不已。他深知“俭以养德,侈必生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训导其子司马康要向正考父、季文子、李文靖、参政鲁公、张文节学习,戒奢节俭,勉

励子孙要行俭戒奢,做到廉洁俭朴。

受父亲的影响,司马康为人节俭,一生为官清廉。据《宋史》记载,司马康“为人廉洁,口不妄财”“初,光立神道碑,帝遣使赐白金两千两,康以费官给,辞不受”“途之人见容止,莫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

俭易廉而奢易贪。纵观历史,“清廉”始终是选拔官吏、考核官员政绩的一项重要重要标准。《周礼》中记载,“以二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这里所说的“六计”就是当时官府用来评判官吏政绩的标准。秦代确定了“五善五失”考核法,“廉”为“五善”之一。汉代进一步完善了对官吏的考核,形成了以《上计律》《考功课吏法》为核心的考绩制度,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旨在通过强化考核力度来建设一支清正廉洁的官吏队伍。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社会较为动荡,但统治者对于官吏的考核并没有停止。在晋朝,考核官吏仍以“正身”和“公廉”为首。到了唐朝,官吏考核实现了制度化、法律化,最著名的当属“四善二十七最”。其中,“四善”为“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宋朝初年,对官员的考核标准大体沿袭了唐朝,到了真宗时期,又将考核标准分为上、中、下三等:“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善、清白而无治声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明清时期在考核官吏时,也始终把“清谨勤公”和“居官廉恪”放在首位。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将廉洁俭朴作为自己的政治操守,始终与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连接在一起,成为战胜一切困难、攻克一切艰险的制胜法宝。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应当牢固树立清廉的价值观念,把廉洁当作一面镜子,保持高度的警惕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时时做到自律、自省、自警,如此才能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经得住各种诱惑与风险的考验。

(作者单位:中共曲阜市委党校)

RCEP市场。三是加快发展数字贸易。数字贸易已成为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增长点,要加快济宁市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大力开展跨境电商培训,加快发展数字贸易。

坚持共享发展 彰显转型成效

在城市转型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是要正确处理产业转型和民生改善的关系。产业转型升级,首先要考虑投资项目对促进就业能发挥多大作用。二是加大采煤沉陷区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投资。三是妥善解决下岗矿工、失地农民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针对失地农民,优先安排其就地就近就业,开辟农民增收途径;对下岗矿工、停产企业职工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劳务输出、技术转岗、就地消化等渠道对职工进行妥善安置,处理好工资、社保、劳动关系等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共济宁市委党校 本文系第一届淮海经济区党校智库合作联盟课题《济宁市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

子贡赎人、子路拯溺与儒商精神

■丰家雷

子贡和子路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都在孔门十哲之列。《吕氏春秋·察微篇》记载了他们俩的故事。

关于子贡的故事,大意是这样的:春秋时期的鲁国有一条法令,如果鲁国人在其他诸侯国发现同胞沦为奴隶的,有人能把他们赎回来,则可以到鲁国的国库中报销赎金。子贡从其他诸侯国赎回了做奴隶的鲁国人,但他没有接受官府的赎金。

孔子批评他此举失当,认为子贡赎回奴隶后根据法令拿应得的酬金,这并没有损害行为本身的价值,但如果不拿应得的酬金,那么从此以后,鲁国就少有人再愿意为同胞赎身了。

子路的故事则是这样的:子路救了一个落水者,落水者为了表达感谢,送了他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听后很高兴,说从此以后鲁国人一定会有更多人勇敢救落水者。

孔子作为大思想家,的确见微知著,洞悉人性。按照我们普通人的想法,一定会认为,子贡道德高尚,高风亮节,做好事不求回报;而子路则差了些意思,因为他虽然做了好事,但也接受了酬谢。

孔子曾有言,“万事,不过义、利二字而已”。鲁国法令的本意,是让人们把落难同胞从外地赎回来,事后得到国家的补偿和奖励。而子贡的做法,固然为自己赢得了好名声,但同时也拔高了人们对“义”的标准,无形中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了,长此以往,那些赎人之后再去向官府要钱的人,可能就得不到人们的赞扬,反而会被嘲笑,甚至责难。做善事的人出力出钱还惹麻烦,那再遇到该施救的情况可能就会装着看不见。本来是正常善举却变成了道德绑架,鲁国的这项善政也就无法施行下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子贡的做法的确不是一件善举。

违反常情、悖逆人性的“义”并不是儒家文化中真正意义上的“义”。曲高往往会和寡,要求过高会让普通人望而却步,感到高处不胜寒,再至诚至善的事情也会无人响应。

反观子路,表面上看起来不拘小节,但他没有去刻

意地提升“义”的标准,行善后毫不介意接受回报,普通人就会愿意效仿学习他的行为,能够以他为榜样。有这种“义”“利”平衡的社会行为导向推动,良好社会风气也就不难实现了。

人做事情,尤其是影响力大的人做事情,往往带有示范效应,因此不能就事论事,而应该更看重事情所产生的溢出影响。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人世思想就是希望人们积极地面对人生,热忱地投入社会,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后来,子贡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下不断成长,成为了儒商的开山鼻祖。人们常说的“端木遗风”,就是指子贡留下来的诚信经营的风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说的也是子贡。

儒商是儒家思想在商业经济活动中的具体实践者,经济行为带有浓重的儒家文化特色,“商”是本质,“儒”是特点,其价值观的核心就是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左传》中这样记载孔子认为的义、利关系:“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用礼法维护道义,用道义产生利益,用利益来使老百姓太平,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

经济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经济,追求利益是社会前进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任何人都不能不面对义与利的选择问题。

儒商是把“商”的职业和“儒”的道德规范、伦理品质结合起来的市场经济活动主体,所强调的价值观念是义利并举、义以生利、先义后利。这也是儒商有别于其他商人的重要标志。

义与利的平衡协调,也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两者不可偏颇,“过犹不及”,过分强调哪一方面都会带来祸害,社会的天平就会倾斜。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一个企业只注重“义”,不注重“利”,只有付出,没有回报,企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或许一时高歌猛进,但不会长久,很快就要虚脱。

在商言商,谋“利”是商人的本分。可若只注重

“利”,企业也无法长久。因为企业是经济主体,是要与其他人、与其他经济体打交道的,也要在互利互惠中实现价值交换。如果唯利是图、利欲熏心,眼睛只盯着自己的“利”,不顾及其他人和公共的“利”,甚至把个人的“利”凌驾于大众的“利”之上,那么必然会众人防之若贼,路子越走越窄,到头来只能被市场抛弃。让别人无利可图,注定自己也会无路可走。

义与利并非天生对立,有时候,义就是利,是公利,是整体的、公共的、长远的利。儒商强调的义就是把公共的利益放在个人的私利之前,私利不应该损害公利。而“利”的最终目的也是服务于“义”,葆有救世济民的忧患意识,并承担起则兼善天下的社会责任。义与利的背后是文化与经济,它们的关系也就是意识与物质的关系,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儒商精神对于经济行为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用“义”规范引导约束“利”,则经济健康发展,公共秩序有序循环,社会风气向上向善。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传承儒家文化,弘扬儒商精神,目的就在于让更多的企业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经济活动中践行现代企业的道德伦理和价值取向。

在经济加速转型的当今时代,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一系列商业道德问题,弘扬儒商精神,让义利并举的价值观深入人心,有助于推动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秩序良性循环。

众多儒商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企业具有长远眼光、大局观念,以义为先、义利并举,积极履行责任,勇于承担义务,能够为其经济行为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和品牌形象。对于企业而言,这是最大的“利好”。

新时期儒商精神所追求的义利并举,就是中国传统商业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相融合的精神产物,是儒家文化的重义原则与市场经济的重利法则的对立统一。其实践的最优结果就是既躬行了“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准则,又创造了灿烂的商业文明。两者的有效整合,就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金钥匙”。

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政德大家谈

济宁政德教育干部学院主办

■梁桂雪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全局出发,紧密契合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形势需要,围绕如何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把对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认识推向新的高度,为新时代加强党员干部权力观教育提供了重要指导和根本遵循。在权力观、政绩观和事业观中,权力观是基础,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政绩观和事业观皆由权力观派生。有什么样的权力观,就有什么样的政绩观、事业观。所以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事业观,首先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所谓权力观,是指人们特别是执掌国家政权的人对待政治权力所涉及的基本问题的观点、看法和态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力为民所赋,权力为民所用。”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来源、本质、价值取向、运行准则,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力观。

深刻理解“权力为民所赋”,保持对人民的敬畏之心。从理论上讲,权力来源于谁,就必然要对谁负责,因此对权力来源的看法是权力观的基础。分析从古至今对政治

权力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实践,大体可以将权力来源归纳为两种,即“君权神授”和“主权在民”。“君权神授”预设存在具有绝对权威高高在上的“天”,统治者受命于天,民众必须对君主保持绝对服从。我国古代把最高统治者称为“天子”,其诏书首句为“奉天承运”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此外,经由社会阶级与封建专制统治长期抗衡,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主权在民”,这一理念坚持国家主权属于民众,公职人员并非民众的主人而只是为其工作的办事员。“主权在民”打碎了“君权神授”带有神秘意志枷锁,将权力的来源从神坛拉回人间,因此有一定进步性,但受资产阶级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利益集团的限制,它始终无法真正代表全体民众意志。社会主义国家是由代表新的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带领“大劳动人民经由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起来,它结束了少数剥削阶级统治的局面,以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保障了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虽然理论上讲,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主人,但现实中看,每个人直接管理国家所有事务又有明显的执行困难。因此,在中国,广大人民通过参与民主选举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由它选举人民政府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

的权力。所以,从本质上讲,少数国家工作人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权利的委托,即使是考选的公职人员其岗位因从属于公共权力,也天然带有为民服务职责。综上,在我国,政治权力其本质是公共意志的象征,它来源于人民,只能代表并服务于公共利益。公职人员的政治权力都不是天生的、绝对的、永久的,更不是专属于某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和谋利工具,它能够被赋予,也能够被免除收回。因此任何人都不能因为常居其位手握权力而忘乎所以,而要权力与担当抱有敬畏谨慎之心。

深刻把握“权为民所赋”,履行为民造福的职责。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曾讲,“在代议制逻辑中,政府与民众订立契约的目的只是为了民众的和平、安全和福利。”现实中,由于人民和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主权在民、治权在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按照契约精神,党员干部应当紧密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知民所想,察民之所虑、亲民之所爱、解民之所需,找准权力使用的着力点,创新工作思路方法,确保决策符合新发展理念要求,尽全力解决群众的生活所需所盼,充分体现权力服务于民的效率、力度和温度。(作者单位:济宁政德教育干部学院)

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

■韩文滕

“忠恕”一词出自《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认为自己的学说可以用一个根本的原则贯通起来。曾子对其做了总结:不过是“忠”和“恕”罢了。从此,“吾道一以贯之”与“忠恕”成为千百年来儒学探讨的重要主题。

“忠”和“恕”二字我们非常熟悉,现代很多词语中也有使用。那么,如何理解儒家的“忠恕之道”呢?朱熹注: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在朱熹看来,“忠”是立足于自身,要求尽己之力以为他人;“恕”是着眼于他人,由推己而及人。在冯友兰与杨伯峻的观点中:“忠”是仁的积极面,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仁的消极面,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忠,敬也。”孔子虽然没有明确地解释“忠”,但其含义却蕴含在《论语》之中。《论语·学而》篇中记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其中“为人谋而不忠乎”是指为别人办事是否做到尽心竭力了

呢?这里的“忠”也就是“尽己”之意。《论语·雍也》篇中记载,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里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践仁行的方法,同时也是所谓的“忠”,即自己想要成功也要使别人能够成功,自己要想通达也要使别人能够通达。所以,“忠”达到的结果是利人,即竭尽自己所能为他人办事。具有尽力、尽心、忠心地对待别人的意思。

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文解字》中解释为:“恕,仁也,从心,从如。”孔子在《论语·卫灵公》篇中明确地解释了“恕”。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这里,孔子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思想,即自己不喜欢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恕道思想强调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所以,“恕”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按照这些注解,我们会发现“忠恕之道”蕴含着极高的智慧,不失为当代人仍需借鉴的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了解儒家“忠恕之道”,绝不是为了发泄怀古之忧患,而是为了发掘其时代价值,解决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首先,有助于提升个人道德素养。人们一旦道德行为失衡,通常会从外部环境或他人身上寻找原因,很难从自

身道德自觉上去反省。“忠恕之道”能启迪人们反求诸己,通过内省不断加强自我修养;其次,有助于调节社会人际相处。“忠恕之道”是指用对待自己的态度对待他人,既包括“忠”的积极道德要求,它能够促使人与人之间取长补短,互利共赢,从而带动人与人之间共同进步,共同发展。也包括“恕”的消极道德限制,它能够引导人与人之间学会宽容尊重,换位思考,从而减少因人际关系处理不当而产生的矛盾冲突。再次,有助于改善国际交往。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为世界多国所接受,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共识。在联合国总部大厅里,就悬挂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标语,这些都是“忠恕之道”的生动实践和传承。如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一带一路”的丰硕成果,都在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康庄大道上书写着中国智慧和方案。

“忠恕之道”是贯穿孔子学说的重要内容,是仁学思想的具体运用,是达到“仁”的重要途径,做到了“忠恕”也就做到了“仁”。“忠恕之道”时至今日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在个人与群体、理性与欲望、权利与义务、幸福与责任之间构建了一条平和、通达的道路。(作者单位:济宁政德教育干部学院)

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济宁资源型城市转型

“双碳”背景下济宁市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更为迫切,因此,要紧紧围绕黄河流域、南四湖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一是加强采煤陷地综合治理。企业和地方政府要相互协作,积极探索陷地复垦,基本农田治理、生态环境修复和湿地景观再造的综合治理长效机制,深入挖掘生态经济价值。二是加强湿地保护修复。要持续扩大济宁国际湿地城市创建成果,构建山清水秀、

资源要素吸附能力。三是抢抓淮海经济区协同发展机遇。着力推动《淮海经济区协同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落地实施,加强与淮海经济区各省市合作交流,进一步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学习借鉴各省市经验,如徐州资源型城市转型经验。

坚持绿色发展 打造生态之城

“双碳”背景下济宁市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更为迫切,因此,要紧紧围绕黄河流域、南四湖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一是加强采煤陷地综合治理。企业和地方政府要相互协作,积极探索陷地复垦,基本农田治理、生态环境修复和湿地景观再造的综合治理长效机制,深入挖掘生态经济价值。二是加强湿地保护修复。要持续扩大济宁国际湿地城市创建成果,构建山清水秀、

河湖湿地美景天成的生态城市图景。三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推进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深入实施能源结构调整,加快构建现代能源体系;持续推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基本形成大宗货物和集装箱中长距离运输以铁路和水路运输为主的格局。

坚持开放发展 打造开放高地

要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一是鼓励企业开展资源能源国际合作,建设境外资源能源开发基地。二是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主动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开拓日韩、东盟等优势市场,扩大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主动帮助企业用好用足RCEP关税优惠、原产地累积规则等红利,开拓

■李爱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源枯竭地区经济转型发展是一篇大文章,实践证明这篇文章完全可以做好,关键是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济宁是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探索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路径。

坚持创新发展 加快产业转型

在济宁市煤炭储量产量下降的大趋势下,迫切需要通过创新驱动发展培育接续替代产业。一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对传统制造业“智改数转”,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济宁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集群化、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发展,打造“231+1”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全面增强制造业竞争力。二是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以“放管服”改革为主线,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激发市场活力,壮大“四新经济”,培育一批“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催生新的接续替代产业。三是发展现代港航物流为突破口辐射带动产业转型。以争创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和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为目标,打响“济宁港航”品牌,联动贸易、金融服务、临港产业等相关产业,推动城市转型。

坚持协调发展 强化协同合作

为加速城市崛起,要积极探索区域合作模式,加快形成竞争有序、共享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一是加快“都市区”一体化融合发展。加快推动“都市区”各板块之间在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公共服务、要素保障方面的互联互通,提升济宁城市首位度。二是加快融入全省“一群两心三圈”发展格局。积极承接省经济圈的产业、技术、人才等外溢,提升对鲁南经济圈